

何一成
著

湖南省优秀社科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专题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度



何一成
著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专题研究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0 0 5 年 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何一成著.—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

ISBN 7-5438-4207-6

I.马... II.何... III.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中国 IV.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3397号

责任编辑:章红立

装帧设计:陈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

何一成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40,000

ISBN7-5438-4207-6

A·43 定价:28.00元

目 录

导论	(1)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	(16)
1.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6)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	(31)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40)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73)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73)
2. 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86)
3. 中国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基础	(97)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	(107)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的奠定	(107)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确立	(138)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形成	(174)
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198)
1. 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态度	(198)
2. 鲜明的民族本位思维方式	(215)
3. 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题	(225)

4. 在突破苏俄模式中实现中国化	(229)
5. “始于毛，成于邓”的理论创新	(234)
五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50)
1. 传统文化精华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	(250)
2.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和互补	(255)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265)
4. 传统文化糟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273)
六 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84)
1.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	(284)
2.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	(294)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创新开辟广阔的前景	(301)
七 中共主要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314)
1.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14)
2. 陈独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27)
3.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38)
4. 张闻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54)
5.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68)
6. 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87)
7. 江泽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95)
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406)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	(406)

2.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实践精神	(412)
3. 坚定不移地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	(419)
4. 与时俱进把握国情，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424)
5. 始终沿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430)
后 记	(434)

导 论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的“七一”讲话中说：8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也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从 19 世纪末传入中国到现在已经 100 多年了。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已经历了三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可以说这些发展变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程度和水平是同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导中国人民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自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引导中国人民将一个连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的中国变成初步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伟大历史性飞跃，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解决了在 21 世纪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引导中国人民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阶段性理论成果，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含着中华民族的

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在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比较早。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其实早已“中国化”了。西方学者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一种倾向于把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这主要以费正清、列文森、罗兹曼等汉学家为代表。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如列文森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井田制的翻版”，“中国共产主义者撰写的历史都似乎持有是非儒学的态度，而实际上，又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对儒学的继承。”作为研究现代化的“新文化学派”著名代表罗兹曼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政策加强了儒学遗产的种种因素……中国共产主义者攻击许多传统，但最终却依赖于集体主义、家族中心的、公社取向的、裙带关系的和个人化的极端联合。”另一些美籍华裔学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一致性时，则往往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范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类似，或者中国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唯科学主义”立场上的相通。有的华裔学者干脆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本来就与儒学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发展了那些与儒学传统相符合的因素。当然也有的汉学家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有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是产生于西方的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是对儒学思想的继承或延续。这两种似乎对立的意见，实际上有着重要的一致性，即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上。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不过，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化”问题研究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

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准确、科学。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必要性和意义作了初步阐释。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然而“文革”前有关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研究则完全陷入了教条化和神秘化的误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点，也使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探究及学问研讨的境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就相应地正式提上了日程。到20世纪9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又掀起了新一轮高潮，学术界、理论界公开发表了不少专著和文章。其中既有通史式的考察与审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纵横结合的探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内容、根据、途径、理论成果及其历史进程作了一些梳理，提出了不少创见，当时的“东亚热”讨论就是伴随“中国化”呼吁而兴起的。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些学者提出原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了，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于怎样“中国化”，有的倡导“寻找活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建议“中、西、马大融合”，有的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作重新解释（比如，有人致力于论证“中国化”的途径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人提出与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如干脆“用儒学替代马克思主义作为过渡时期的意识形态”，等等）。

由此可见，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十分复杂，西方汉学家与华裔学者之间有分歧，国内学者之间的观点也不一致。有两个原因可能是主要的：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体系的复杂性。西方学者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儒学，旨在强调它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因素。而在当前的经济转型中，一些中国学者

呼吁“中国化”，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简单地等同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则是根据马克思主张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以为社会主义必须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后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看法主要源于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反映了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而“马克思主义”则包括一系列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其复杂性就更是不言而喻了。其二，实践的复杂性。任何社会历史的运动都包含着许多侧面，为不同角度的观察者提供不同的图像。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反对“封、资、修”的政治运动，却包含着许多封建主义因素。一个是理论的复杂性，一个是实践的复杂性，它们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自然为不同的见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状况同毛泽东思想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及其有关研究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几乎同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热潮则是随着毛泽东思想在学术意义上全面系统研究的开展而兴起的。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次高潮有其必然的共同原因。第一次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正在兴起第三次高潮，它们都是由人们对实践的反思直接引发的。具体地说，第一次高潮是在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纠正党内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而兴起的；第二次高潮既肇始于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批判，也源于苏联及东欧剧变与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等问题的反思；第三次高潮则是人们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关注的直接回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虽然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但是作为完全学术意义上系统的独立研究尚属起步阶

段。尽管如此，由于理论工作者们的努力，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科学规范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有人认为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新鲜化，还有人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范畴来界定它。这些看法虽然表述不同，角度不一，实质和内容却是一致的，即指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根据，学术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论证，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的理论，具有开放性、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点，决定了其生命力就在于同实践相结合，在斗争中发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根据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被接受和继续发展的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表明，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中国特殊的国情也要求马克思主义根植于华夏大地。此外，学术界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具有本民族的言辞特色和新的理论成果，把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一种方法论。

第二，初步分析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学术界一般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国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探索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以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抗日战争中后期到解放战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全党认同并自觉运用；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由于越来越脱离中国实际而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阶段。

第三，论证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创立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大家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首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所著《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他领导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历史性飞跃，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与历史成果，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三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江泽民根据 21 世纪的新情况和新要求，

对新时期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作了新的思考和概括，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第四，总结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错误思想。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但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都知之不多，理解不深，曾经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在实践斗争中接连犯过多次“左”的或右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沉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①，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正确的科学指导作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针对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进入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造的阶段。

第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定义、途径、成果均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一致肯定《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贡献是：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了哲学上的科学论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提供了文化转换中介，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在中国的现实应用和通俗化开辟了道路。

第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与阶段性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诸如中共早期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国民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所开展的工作；抗战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经验，等等。这些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历史考证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重大而且复杂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因此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些理论问题尚未涉及或待进一步探讨。

首先，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反思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过许多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痛苦。科学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成功地实现三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经验，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应该看到，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有些倾向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如“以俄为师”的心理定势、“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对立论”的绝对化思维方式和“现实的需要”与“需要的理论”的片面性论断等。而且，中国人开始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暴力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容易使人把这些理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全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及其恶果的批判总结，抗战时期艰难困苦和各类矛盾复杂多变也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具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抗日战争丰富多彩的实践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广

阔天地。所以用更广阔的视野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既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要求，也是中共总结经验教训的历史选择，还是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必然趋势，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和一致性。

其次，还需要对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挑战进行理论的分析 and 预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还是一个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永远面临着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就理论上的挑战而言，涉及如何对待和评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长期以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不同程度地造成了某种思想混乱。例如，国内有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为仅仅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有人把它曲解为实用主义式的随意套用，有人甚至将它看成“封建化”。在国外，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抛弃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扭曲和变形，或者干脆将它等同于民粹主义，或者说成是为了树立毛泽东权威的“权力斗争需要”。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乃是关系到能不能正确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就实践上的挑战而言，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如何适应中国具体实际的变化，为中国社会转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再次，还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文化基础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地仍停留在理论构成的分析上，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实践观等，因而它们之间能够相互沟通。这种分析无可厚非，但倘若真正将此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据，那就似乎有一些牵强附会了。实际上，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它具体的理论构成，而在于其基于自身生产和生活实践对人与

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方式结合起来，赋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整合、创新，进一步实现思维方式的转换，才能减弱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时可能出现的隔阂、疏离的文化心态，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真正化为全民族自觉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意识，而不是贴标签式地浮在面上的泛泛空论。这就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怎样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等问题。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廓清，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结合进一步作理论上的注解，也正是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和分歧，需要来一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提升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现代化视野是一个长程历史的视野，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理论与现象放在这个视野之中，我们就会首先看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启蒙思想的一致性。特别是在反对封建主义上，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启蒙思想是密切的战友。“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这些都是现代启蒙的口号，被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继承，包括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按劳分配”口号也是在西欧启蒙运动时提出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启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人们只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现代启蒙思想的否定，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就会从人类历史上消亡，这是历史视野狭隘所导致的错误认识。这种狭隘的视野由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复杂情势所造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冷战格局所强化，所以随着冷战格局解体，许多西方学者便纷纷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与

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的一致性。不管怎样，这种学术趋势说明人们开始寻求把不同学说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中进行理解了。人类各种思想体系的对立本来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都是对运动着的复杂社会现象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的把握，因此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既有分歧又有共见。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启蒙思想、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启蒙思想都是现代社会的理论，在反对封建主义专制、家长制统治、传统的集权官僚政治、宗教迷信、愚昧、压迫、不劳而食等问题上，以及提倡自由、平等、民权、科学、理性、普遍主义原则等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价值观方面，马克思主义同现代启蒙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同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民主性的精华沟通的关键所在。

现代化视野还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曾经引起许多争论的两个历史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包括10年“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体制上引进了计划模式，在思想上逐渐走向教条主义，在社会生活上出现运动化以致“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对人的迫害，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至今仍然在社会各个层面留下深刻的痕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这也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但这仅仅是历史现象的一部分，如果只根据这部分表象看问题，就会导致一系列的认识误区。从现代化的长程视野来看，尽管“前30年”在经济上失误太多，但在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封建主义思想制度结构，比如土地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家庭血缘团体、小宗派团体、私情关系团体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为“文化大革命”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后深层的历史任务也有反对封建主义，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多种所有制共存